

# Obey the Art and Culture Belief

## 遵命艺术与文化信仰

张新英 Zhang Xinying

2006年11月30日至2007年1月5日，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和观澜美术馆联合举办了“承前启后——2006中国当代版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陈烟桥父子艺术展”暨“20世纪的中国与版画”学术研讨会系列学术活动，其目的是对20世纪的中国与版画艺术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并对20世纪50—80年代这段堪称是中国创作版画发展最为成熟的时期进行深刻的剖析。“承前启后——2006中国当代版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展出了包括吴凡、修军、吴俊发、黄丕谟、李焕民、晁楣、李宏仁、曹剑锋等成熟于20世纪50—80年代的一代版画家的代表作品180余幅；“陈烟桥父子艺术展”展出了我国已故观澜籍著名版画家陈烟桥的遗作40件、其子陈伟南的油画及版画作品40件，同时还展出了陈烟桥家属珍藏的历史文献资料；“20世纪的中国与版画”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教授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齐凤阁教授担任学术主持，邀请了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福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声等在内的十余位来自全国的美术史论家就“承前启后的中国版画”和“陈烟桥艺术研究”等课题进行了研讨。吴俊发、黄丕谟、李焕民、晁楣等近30位版画家参加了全程的学术活动，并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他们所谈及的对当时艺术创作的理解以及对当下艺术发展的见解发人深省，引发了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我如下的思考：

20世纪文艺界最具争议、最引人注意的现象莫过于“遵命艺术”的产生。广东美术馆在2005年曾经举办过一个题为“毛泽东时代的美术”的展览，而“遵命艺术”便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到1979年以前艺术的专指。20世纪40—70年代末，从中国画领域“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题材、油画领域大型历史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到版画领域“颂歌形态”

版画创作的产生，标志着一个“遵命艺术”时代的形成。我们无法拿一般的标准去评价那样一个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遵命艺术”背后的文化信仰，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灵魂为物欲主义所禁锢、信仰缺失”的时代，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便有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意义。

### 一、“遵命艺术”的本体特征

从客观上看，这个时期的艺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在创作思想上，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多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直接导向。苏联著名美术家约冈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如下的概括：“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历史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也主要谈到了“文艺为什么人”以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是为了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一指导思想成为影响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重要思想，其直接的结果便是艺术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的广泛探讨和各艺术领域民族化和大众化艺术风格的转变；2、在题材的选择上，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多表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社会内容，如李焕民的《攻读》、晁楣的《第一道脚印》等。与油画领域的大型历史题材不同的是，版画领域多选择典型的人物或风景题材，注重作品的抒情性；3、在表现手法上，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多采用写实的方法，通过对具体人物和景物的描绘，创造出一定的“实境”；此外，在现实主义主体风貌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版画还强化了艺术审美的教化功能。

### 二、承前启后的中国版画的“遵命”艺术形态

术形态

如果说20世纪的50—70年代末是一个“遵命艺术”的时代，那么版画则可以称作是这一时代最具经典性、最为活跃的一个画种。

据统计，版画在建国后各艺术种类的发展中占很大的比重，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并联合举办了艺术作品展览会，其中版画居各画种之首，有101位版画家的181件作品参展；1954年9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版画展，参展画家85人，展出作品196件；1956年10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版画展，参展画家158人，展出作品331件；1959年的第四届全国版画展，应征作品竟达1200余幅，而且版种多样，均具有相当的水平；1963年的第五届全国版画展，在各方面又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期间，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版画的群众影响，在全国形成了普及之势。在“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方针指引下，形成了一股业余版画创作的热潮，不少版画家在各地举办业余版画辅导班，一些工厂、人民公社和部队中都出现了版画学习小组，创作出一大批工农兵版画。从1979年起，各地的群众性版画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至1981年三年间，全国成立版画组织近40个，而至80年代中期已达百余，除一些专职版画家和美术院校的版画教师外，又出现了一支非专职性版画家队伍，其中包括工人、农民、部队官兵，此外还有一支儿童版画新军，中国版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

从“承前启后”的中国版画来透视“遵命艺术”的价值形态，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首先，“遵命”版画从主观上是“人民的艺术”，版画家们带着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通过培训班等形式普及版画知识，培养专业或

者业余的版画创作队伍，从而使版画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遵命”版画从客观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发源于生活，深入生活，并且反映生活，从而使其具备了与受众可资交流的公共因素，使版画与观者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具备了公共性；再次，“遵命”版画从整体上是“社会的艺术”，它不是脱离社会发展而存在的空中楼阁，而是“以其特有的语言形式敏锐地反映了新的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能动地捕捉了那样一种时代精神在人们内心的折射”。版画由建国前的“社会形态”向建国后的“艺术形态”的转化本身即说明了它紧随时代步伐的社会性，正是社会环境的改变、创作条件的不同，以及接受者审美期待的差异促成了建国后中国版画由外向内的转变。理论家邓福星说：“这些版画作者创造的正是也只能是这样的版画作品。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版画，才适合当时的受众。这些版画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是最少隔阂和障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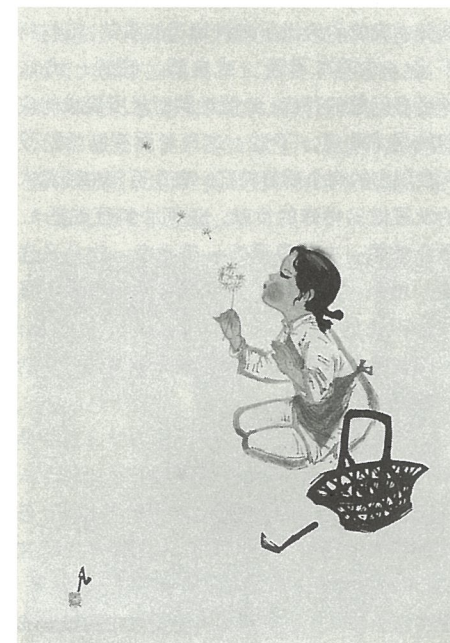
### 三、“遵命艺术”与文化信仰

以当下的标准来回顾当时的版画创作，或许觉得艺术家的个性已经被刻意表达的艺术理念所覆盖，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也已经被溢于篇幅的说教气所取代，然而“遵命艺术”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影响却提醒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其背后的文化信仰问题。进入21世纪，也有为数不少的理论家投入对“新中国美术”、“新时期美术”和“文革美术”的整理和研究，发现了其中“遵命”与“信仰”的差异：建国以后，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之后，再进入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文艺界对现实社会的热情、对新生活、对所有新生事物的热爱以及对参与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积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纪的中国与版画”学术研讨会上，版画家李焕民，吴俊发和赵宗藻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谈到了当时艺术创作的状况，批驳了“遵命艺术”的提法，认为当时的创作是“真诚”的，是受到新社会、新生活感召的。“这些版画作者毕竟以

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的真诚投入了他们的创作，这是艺术创作最需要和最宝贵的。仅这一点，已使当下许多画家汗颜”。目前看来，这种真诚的信仰在当下的文化情境中，尤其难能可贵。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首先应该保证它的文化属性，“遵命”版画的成功正在于它蕴涵在群体现象之下的文化针对性，在于每一幅版画作品明确的“文化身份”。自上个世纪中期的艺术运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艺术价值标准和文化审美体系，新的“文化身份”的重建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人尚未将西方百余年的艺术发展脉络厘清并完全消化的时候，信息时代又已经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不期而至，“地球村”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梦想。这一切近而又模糊的梦想掩盖了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对艺术个性和自我彰显过分强调的背后，是对“权力话语”不约而同的无力和认同。正如朱其在谈到“漫画一代”的时候所说的：“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在90年代抹去了中国地区间的文化差异，这已经反映在‘70后’的艺术中。而漫画艺术这一代则甚至也在抹去与日本、韩国、美国等同一代年轻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迷乱的梦呓和语言的无力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而此时当我们再次回首20世纪以群体姿态出现的“遵命版画”，便不能不为它的言之有物和语言之力度所折服。另一方面，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应该忽视它的社会属性，它同社会的关系恰如“胎儿”和“羊水”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然而当下的艺术在有些时候却如“试管婴儿”一样忽略了自身和母体的关系，摒弃艺术的社会属性，忽视艺术的公共因素，“艺术的公共性已经缺乏到让‘恶搞’成为‘时尚’的地步”。相当一部分当下的艺术作品给观者的只是对人性的冷漠和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很难想象这样的艺术作品切断了自己与社会的联系，失去了与第三者交流的关系，又怎么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呢？

当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艺术运动打破了中国成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信仰，中国当代艺术便进入了一个无主流、无信仰、无秩序的时代，形形色色的新艺术形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思潮的冲击摧毁了原有的价值评价体系，对“话语专利”的追逐和对标新立异的推崇也混淆了善恶美丑的界限，私密性、破坏性、乃至充斥着情欲和暴力的表达方式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主体，而社会性的、正面的、稍带说教性、建设性和歌颂性的主题，在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社会内容”的论调下显得无力而苍白。于是在灵魂为物欲主义所禁锢的时代，信仰缺失，艺术便丧失了自己的目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就应运而生。艺术和灵魂之间的关系被麻痹得失去知觉。艺术和公众各自分道扬镳了”。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的悲哀，“遵命美术”的历史影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需要重建信仰的时代，不管社会发展到一个什么阶段，我们还是需要明确，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的目的是什么？艺术的意义是什么？艺术的价值又是什么？



蒲公英 水印木刻 吴凡